

民国时期华北运动会管窥

任谢元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4)

摘要:运用报刊等档案史料对民国时期华北运动会进行研究,看出其二十余年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的个质属性,即:民族危机日深,体育与救国并举;比赛内容日渐丰富,科技运用成为亮点;力量之美彰显,成绩斐然纷呈。因此,就影响力、持续时间而言,华北运动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运动会;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G81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82-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2.013

On the North China Gam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N Xie-y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discovere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China Games in 20 ye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studying the archives of the press. They are as follows: while the national crisis was deep, sports and the saving of the nation happened simultaneously; the number of the events of the games grew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increasingly applied; the more and more skills were employed in the games and the results grew better and better. In conclusion, as far as the influence and the duration are concerned, the North China Gam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orts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North China Games; development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事业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华北运动会,从1913年到1934年,历时二十余年,是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运动会,在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基于民国时期档案资料,通过梳理华北运动会发展历程,分析归纳其特点,一窥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进程。

一、华北地区体育运动的缘起

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下,中国的

近代化开始起步,社会生活异彩纷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传教士、维新派、留学生等为主导的传播群体,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介绍传播到中国,并形成了对占主导地位传统体育的挑战,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恰在此时,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并致力于体育运动的宣传、演讲、竞赛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助推了西方体育在华的传播发展。

作为开放较早的华北沿海城市深受此风的

作者简介:任谢元(1979—),男,山东临沂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史研究。

“沐浴”,体育运动首先在津、京、河北地区的教会学校中开展起来。1898年天津北洋大学举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校际田径运动会^[1]。190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举办了天津城市校际体育运动会,这是全国最早的城市校际运动会。受到天津校际运动会的渲染影响,1905年北京开始举办校际运动会,并辐射波及到附近其他省区,这为城市间体育运动的联合开展打下了基础。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称“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主要由华南、华北、上海、吴宁、武汉五区参加。至此,“华北”一词作为一个整体的单位开始出现,并在以后被频繁使用。

毫无疑问,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之后,使体育运动由传统单一模式转变为新式二元结构,丰富了中国体育的内容,引起了国人体育观念的深刻变化,并逐步获得了国民的认可。体育成为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重要依托手段,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二、华北运动会的发展历程

(一)1913年至1922年:西方人士主导下的华北运动会时期

正是在京津等地近代体育事业新气象的感染和影响下,北方地区才逐步走向联合,促使了华北运动会的产生。在这期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尤其活跃,积极参与北京地区的文化事业活动。1912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京津两地学校的体育倡导者舒美甘(美国人)和张伯苓,开始筹备京津两地的“联合运动大会”。运动会举办之前,借助了当时具有较大支配力和影响力的《申报》进行事前的播报工作,1913年5月24日对“联合运动会”进行了预告:中美国民同盟会发起之联合运动会定于明日举行,有中美军队到场,袁总统特制奖牌三种及大小银杯各一备奖。

在媒体的渲染播报下,1913年5月25日第一次“联合运动大会”(即“首届华北运动会”)在北京天坛举办,吸纳了京津晋等省市的27所

学校参加,设有赛跑、跳高等14个比赛项目。有关第一次“联合运动大会”的比赛成绩,1913年5月26日《申报》进行了宣告点评:昨北京联合运动大会得分最大者清华学校,48点次;通州协合学校,37点次;汇文学校,16点次。袁所备银杯为清华学生潘文炳所得,其运动科目为赛跑、掷铁球、跳高、跳远等等。其职员以中美人分配之,章宗祥夫人为给奖员。此为北京中国学界之创举。

此次运动会规模虽不大,却开区域性体育运动之先河,为此后华北运动会的继续召开奠定了基础,并为华北体育联合会的成立提供了契机。然而,本届运动会的经费主要由美国人舒美甘及体育竞进会的侯克伦筹措,另一部分由美国人卫尔史的电影表演和比克的琴奏表演捐赠而来。运动场地的平面测量、划分也都由美国人负责进行。综观本届运动会,从开始的首倡筹备到现场的职员、场地、经费、规则制定等基本上都是由外国人完成,运动会的主导权、支配权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按照当初商定的年会规则,1914年5月19—20日,“第二届华北运动会”依旧在北京天坛举行。相比于首届,参加学校和比赛项目都有所扩大,成为真正具有华北地区性质的运动会。同时,此届还成立了“华北联合运动会”,推选美国人舒美甘、张伯苓等为执委,负责制定竞赛标准,掌管运动会的一切事务性工作。创办初期,“办理该会者,多为青年会及西人,国人除少数热心者外,教育当局既不注及此,而一般社会尤其为漠视”^[2]。为扭转国人的偏见局面,以张伯苓为代表的华北联合运动会成员历尽艰辛,使华北运动会从组织到规模都获得了较大发展。

(二)1923年至1934年:国人独立自主开展华北运动会时期

随着全国体育战线对外国势力插手操纵中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声讨,华北运动会受北京青年会中美国人控制的局面在1923年开始被扭转。其时,张伯苓决定第十届华北运动会从筹备到举办,所有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以汉语为比赛用语。这破除了外国人士对华北运动

会的垄断控制,开国人自办运动会的先河。为此,1934 年 10 月 10 日天津《大公报》刊载:“自是而后,华北体育界乃大放曙光,纯为独立国家之体育机关矣。各国对我之批评,亦因是而渐佳,中国之体育人才,亦因是而渐众。”

自此之后,华北运动会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最初只有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参加,到第九届吸纳了辽宁省,第十一届(1924 年)后又扩大到山东、河南等省。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因北伐战争的波及,时隔两年后(1928 年)才召开。至此,华北运动会历经二十余年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由初时的单项运动会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型综合运动会。1929 年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闭幕后,华北联合运动会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同时将“华北联合运动会”改为“华北体育联合会”。然而,因 1930 年中原大战爆发,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被迫推迟到 1931 年举行,并由学校团体为单位改为以省市区为单位。这些措施促进了各地参加运动会的积极性,至上世纪 30 年代扩展到了河南、河北、山东、青岛、察哈尔、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等省区,使这项赛会虽名为华北运动会,实则已发展为华北、西北、东北参加的“三北”运动会。

(三)1935 年至 1937 年:华北运动会的终结时期

按照“本届落定,确定下届”的惯例,华北体育联合会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召开期间举行执委会,讨论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有关事宜,因当时会务繁重,筹措经费困难,尤其是日本侵略触角已伸向华北等地,造成人心恐慌、政局不稳,华北体联“决定下届华北会停止举办,并拟请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3]。1934 年 10 月 13 日,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决议会在河北黄绿路工业学院校友楼举行,再次对运动会举办周期进行讨论,“华北运动会自第十九届起,拟请改订为每隔一年举行一次,提案人张贻光、宋君复、宋国模。【议决】仍照以往情形,一年举行一次”^[4]。之后,华北体育联合会又就运动会举办的时间、地点进行反复磋商,均悬而未决。

1935 年,中华民族正值多事之秋,华北事变使亡国灭种危机加剧。学界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加之上海将举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致使各省市再无精力顾及华北运动会,华北体联遂宣布当年停办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1936 年,又因种种事情阻扰,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最终发布宣告停办,“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地点问题,迄未解决,平市因无扩大运动场,故不克接办。青岛、河南、陕西、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市,亦因经济所限,未能接办。致华北运动会本年度不克实现。华北体联会常委马约翰、董守义、袁敦礼、赵文藻等四人均赴德参加世运会,仅留常委张伯苓一人在国内,负责乏人。不独本年度之华北运动会停办,明年又值第七届全运会之期,仍不举办。至于华北游泳赛,亦行停办。冰上运动会是否举办,须俟常委等返国后召开会议决定”^[5]。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华北危机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全民族开始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去,国人再无心思去顾及这种缓慢的“健体格、御侮辱”的体育事业,只奢求速成的“驱敌寇、求独立”的方法,华北运动会被搁置一旁,直至最后走向终结。

三、华北运动会的主要特点

(一)民族危机日深,体育与救国并举

20 世纪 30 年代初,日本公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民族危机刺激着中国各阶层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紧跟抗日洪流,1932 年在开封举行的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形成了体育战线反对日本侵略的另一道亮丽风景线。开幕时,全体运动员绕场一周,东北三省的运动员高举写有“收复失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白色横幅走在最前面。比赛开始后,每逢东北三省运动员出场时,观众都报以热烈掌声。在闭幕大会上,再次强调御侮救国之重要,“当国难严重之今日,须知在运动以外,更有重大使命”,即:注重国民体育,扩大团结力量,御侮救亡^[6]。

1934 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之际,中华民族危机日深,民众反日情绪高涨。陈郁波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盛况》中生动地描写各省市

选手、职员游行时的戎装颜色,“东北五省市均为丧服,白上衣,黑长裤,似寓意黑山白水,使人望而哀悼”。值得一提的是,由500名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组成的“南开啦啦队”,不仅唱校歌和岳飞的《满江红》,而且还通过哨声的变换,进行黑白两色手旗表演,吸聚了会场上3万多观众的目光。“在这次运动会中,最令人瞩目的南开啦啦队,有五百位男女学生在千万观众前表演布旗排字活动,一黑一白,互相组字,动作整齐,图样美观,像组字中的‘勿忘国耻’‘勿忘东北’一类字形,加重了全场严肃悲壮的空气,激动了民众的爱国心”^[7]。随着旗子的变换,啦啦队发出铿锵有力的呼喊:“华北会/十八届/锻炼好身体/休把别人赖/收复失地在关外。”“十八届/华北会/大刀带长枪/熊腰又虎背/敌人见我往后退/敌人见我往后退。”当东北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啦啦队一齐高呼:“练习勤,功夫真/东北选手全有根/功夫深,资格深/收复失地靠咱们。”当察哈尔省运动员走过来时,啦啦队冲着运动员高呼:“察哈尔,有长城/城里城外学英雄/要守长城一万里/全凭你们众英雄。”会场上的观众和运动员被一次次的组字所震动,被啦啦队激昂的呼喊所感动,整个会场的情绪被推向高潮^[8]。

(二)比赛内容日渐丰富,科技运用成为亮点

运动会的竞赛项目,第一届仅有田径等十四个单项。第二届增加了篮球、排球等五个球类项目。第十五届以前,球类与田径分时分地举行,规模不若今时之盛大。自十五届(在济南举行)始集各项球类与田径赛,在同时同地举行。自此规模渐大,每届亦有进步。第十五届将摔跤、武术增加为表演项目,第十七届将游泳增加为竞赛项目,第十八届将体操增加为表演项目。

伴随着比赛项目的日臻完善,各届运动会的承办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将先进的宣传技术和周到的服务投入于比赛中。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召开之前,为吸引民众观看运动会,会前的宣传工作搞得异常活跃,提前将运动会召开的

日期、地点、如何到会场等事项,印刷200张彩色广告、2000份简单说明,张贴在沈阳城内的主要商业区和大街小巷。尤其在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上,承办方更是“煞费苦心”,使科学与技术的魅力得到彰显。为求竞赛秩序严肃整齐,观众不感枯寂,对场内竞赛一目了然,并能及时得到成绩报告,特在大门两旁设大布告牌各一方,其上字幕,可临时配置,同时在大门楼上,依某项优胜次序,而升优胜单位之旗,佐以乐队之吹奏,表扬激励之中,寓鼓舞欢欣之意^[9]。此外,还在市内主要街道落置广告牌8处以及时公布大会公告,设置临时无线电台随时传播大会消息。率先运用拍摄电影纪录片、无线广播等现代传媒手段开展形象直观、生动活泼的宣传,成为本届的一大特色。聘请了当时最大的民营电影企业联华影业公司的著名导演金肇宇,采用摄影方式拍摄代表队和运动员;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投资创办的青岛无线广播电台,用来播报体育赛事。

科学技术发挥出的优势,在第十八届运动会上得到了持续显现。在比赛进行时,将运动场上之成绩,用无线电放送,使市民得知当时比赛情形及结果。同时,还创造性地在球类比赛地点及宣告处设有临时电话,以便短时间内得以报告结果。与崇尚技术一样,承办方“想运动员所想,急运动员所急”,力求服务周到贴心。比如,在径赛起点附近,运动员脱下之衣服,用自由车送至终点,与运动员以便利。在径赛终点附近,设有能出能进之特别门户,以利运动员出场。径赛之起点终点、田赛之掷类跳类各场附近均竖铁杆一根,上有各项运动姿势人影图,以表明某种运动之场所。每项运动决赛以后,将得分单位之旗帜上升,同时奏乐以示表扬^[10]。

(三)力量之美彰显,成绩斐然纷呈

运动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场景,从云天发表在1934年《北洋画报》的竹枝词能窥见一斑,“行人见左不见右,选手顾前不顾后。运动场上坐一天,风吹雨打成‘活受’”。风雨中洒脱的激情,奋战中汗水铺就的路,如闪亮的弧线划

破美丽的长空,送来了辉煌的战果。纵观历届华北运动会的成绩,最突出的是两项保持到解放前夕的全国纪录,即十五届上哈尔滨队女子 200 米接力 28 秒 6 和第十八届上焦玉莲女子 100 米 13 秒 2。每届运动会中,屡破纪录成为常态,在第十三届华北运动会上,十项全能打破全国纪录;800 米跑、1 600 米接力跑打破华北运动会纪录。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上,跳高、三级跳远、标枪、铅球打破华北运动会纪录。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上,1 600 米、400 米接力赛均破全国纪录;跳高、跳远和撑竿跳高、三级跳远、1 500 米跑、400 米跑、800 米跑都打破华北运动会纪录;青岛“何氏三杰”姐妹包揽了华北运动会女子 50 米自由泳的前三名。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铅球破全国纪录;铅球、标枪、铁饼、三级跳远、400 米接力跑破华北运动会纪录。

由于受到奥运会的影响,华北运动会逐渐仿照奥运会的项目和竞赛方法进行比赛,这样许多运动项目比较接近于当时的国际比赛项目,所以许多在华北运动会上成绩卓越的运动员被选拔参加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

综上可知,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是外部文化侵略和内部主动学习、引进、推广等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它同中国反对外来侵略、寻求民族独立等政治形态密切交织。作为区域性代表的华北运动会,由摆脱西人垄断控制到实现独立自主,由舶来品到获得国人的认可,其发展过程深深刻下时代的烙印。华北运动会从根植于教会学校,扩展到校际运动会,再逐步发展到区域性运动会,实现了由边缘文化到主流文化,由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当然,因特殊的

政治和军事环境,华北运动会试图依靠体育事业达到“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道路失败了,但体育运动之“助身体发育,而增其康健”,达到“心之使身,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更可调节脑力之张弛,却其疲劳”等功效^[11],已经深入人心,深度获得了国民的认同,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参考文献:

- [1]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200.
- [2] 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奥林匹克在天津 1896—2008[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25.
- [3] 华北体育联合会一执委第三次会议[N]. 大公报:天津版,1934-10-12(06).
- [4] 华北联合会年会[J]. 勤奋体育月报,1934,2(2):154.
- [5] 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停止举行[J]. 勤奋体育月报,1936,3(11):1029.
- [6] 华北运动会记[J]. 国闻周报,1932,9(42):12.
- [7] 尚树梅.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的印象和批评[J]. 勤奋体育月报,1935,3(2):132.
- [8] 孙海麟. 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82-183.
- [9] 郝更生. 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概况[J]. 科学的中国,1933,2(8):42.
- [10] 谢希云. 华北运动会的几项优点[J]. 勤奋体育月报,1934,2(2):135.
- [11] 周炳琳. 吾人对于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之感想[J]. 勤奋体育月报,1934,2(2):137.

(责任编辑:李秀荣)